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Sub.2/2000/13
15 June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4

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全球化及其对充分享受人权的影响

J. 奥洛卡—奥尼安戈和迪皮卡·乌达加马根据小组委员会 第 1999/8 号决议提交的初步报告

目 录

	段 次
导言和背景.....	1 - 5
一、重审富有争议的全球化含义.....	6 - 10
二、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体制.....	11 - 24
A. 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	13 - 19
B.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机构.....	20 - 24
三、全球化、平等与不歧视.....	25 - 40
A. 第二十一世纪全球不平等与种族主义概况.....	27 - 29
B. 全球化、男女关系与妇女境况.....	30 - 40
四、全球化与适用的人权框架.....	41 - 50
五、联合国机构、机制的作用和地位.....	51 - 61
六、结论与建议.....	62 - 68

导言和背景

1. 人权委员会第 2000/2 号决定回顾了委员会第 1999/59 号决议，注意到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第 1999/8 号决议，决定批准任命 J. 奥洛卡—奥尼安戈先生和迪皮卡·乌达加马女士作为特别报告员研究全球化及其对充分享受所有人权的影响问题，并请其特别重视小组委员会和委员会关于调整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的建议。¹

2. 这两名特别报告员在获得此项任命之前，曾联合编写了题为“人权作为贸易、投资和金融政策及做法的首要目标”的工作文件(E/CN.4/Sub.2/1999/11)，J. 奥洛卡·奥尼安戈先生还曾编写了题为“在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加剧情况下的全球化问题”的工作文件(E/CN.4/Sub.2/1999/8)。这项任命表明，小组委员会普遍关注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问题，它最近尤为关心各类非国家机构的全球影响力及其对实现这类权利的影响问题。例如，在委员会中和小组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人们审查了极端贫困、结构调整、受教育权、收入分配和食物权等问题。最后，设立跨国公司工作组一事表明，小组委员会越来越关注全球化问题。²

3. 这份初步报告阐述了全球化问题所涉的广泛的基本概念，重点审视了这一现象所涉的一些实际问题。考虑到全球化问题的范围极为广泛，特别报告员决定重点审查若干重要问题。其中有的问题极为重要，在这类研究报告中忽视不得，有的涉及特别重要的概念和实际问题，所以也须予以立即重视。特别报告员为这份初步报告选定了两大主题。我们认为这两大主题是全球化现象及其对充分享受人权的影响的核心。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追求全球化关键目标的现有机构。在这里，我们的主要关注对象是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³和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⁴在内的多边机构。当然，我们也审视这些多边机构与国际社会中单个国家的关系。其次，我们审查与平等和不歧视相关的问题，其中特别重视全球化对妇女处境的影响。

4. 最近，全球化现象在全世界引起的注意也许超过了任何其他问题。⁵ 无论从公司大亨和贸易部长的言论来看，还是从电视纪录片、无线电广播⁶和访谈节目来看，全球化问题确实吸引了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力。⁷ 人们乐意谈论这一问题，而且显然并未忘掉与人权的关系。事实上，美国公共广播服务公司最近就制作了

一部题为“全球化与人权”的纪录片⁸。这部纪录片的宣传广告宣称将与观众一道：

“首先前往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这一企业界最高决策人士的聚会，然后去南非金矿探秘，随后再去考察尼日利亚境内引起争议的壳牌公司的油田和耐克公司在亚洲设的鞋厂，看看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宏观决策者与穷于应付这些决策后果的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冲突。本节目的核心内容是报道目前关于是否应将人权关注与这些政策挂钩的辩论”。⁹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全球化显然并不是转瞬即逝的浮云。¹⁰ 另外，这一现象显然能引起大量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抵触的解释，在涉及质量评估或价值判断时尤其如此。人们对全球化的影响感到有些迷惑并越来越慌乱正说明了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全球化无疑对我们的本研究报告最关注的国际法律和惯例制度——国际人权制度产生了若干影响。

5. 1999 年 12 月在西雅图市和今年 4 月在华盛顿市爆发的示威活动使全球化现象显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是从前对此项问题的讨论从未做到的事情。¹¹ 这些示威活动还突显了全球化现象的多重性质及其对整个一系列当代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关系的潜在影响。示威活动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对学术辩论和讨论来说，还是对国际关系、可持续的人类发展以及国际人权的促进和保护工作的总体运作来说，全球化仍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正因为全球化现象激起了这么多不同的反应，小组委员会须认真确定最宜由其负责的全球化问题所涉的某些具体和明确的内容，力求阐明和澄清、而不是尽量淡化或遮掩其基本特点。

一、重审富有争议的全球化含义

6. 全球化现象自成为 20 世纪末和新千年期最热闹的一个话题以来，以多种方式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从信息高速公路到毒品和军备国际贸易，到《苹果计算机世界杂志》、耐克鞋以及全球新闻媒体巨大的影响，所有人都在大谈特谈全球化问题。多数讨论的核心主题是，技术和信息飞速发展，大大改变了时间和空间概念。尤其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已成为全球生产系统中也许最举足轻重的力量，对当代人类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¹²

7. 我们认识到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随之应运而生的全球经济力量对全球化的兴起所起的作用，但问题是有人夸大了全球化现象的经济含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些人头脑僵硬，只看到全球化所涉的经济内容，把全球化置于所有其他人类价值或现象之上，甚至将其置于人类基本环境之上，¹³ 结果轻视(或掩盖)了全球化现象的社会、经济、尤其是政治根源和影响。正如巴西总统恩里克·卡多佐先生指出的那样，只把全球化看作是市场力量运作的结果是一大错误。他说：“市场运作范围是各国政府在象世贸组织这样的多边论坛中以政治方式进行直接谈判后确定的。这类谈判始终离不开权力游戏。”¹⁴ 而且，权力游戏规则是由极少数国家确定的，但却影响到绝大多数国家。因此，只有在认识到全球化现象所涉的政治以及其他内容的情况下，才能制定合理、审慎的对策。¹⁵

8. 考虑到全球化的多重性质，必须了解这些事态背后除了纯粹经济因素之外的各种动力，另外还应搞清楚所来自的不同方向。Paul Streeten 先生指出，全球化可以“从上而至”，例如跨国公司、国际资本流动以及世界市场带来的全球化。¹⁶ 这类全球化离不开当代国际贸易、金融和投资制度所依赖的不断发展的法律体制和机构体制。普遍的国际经济法最恰当体现了法律体制，而布雷顿森林多边机构和世贸组织则是机构体制的具体代表。

9. 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则是从下到上式的，例如环境运动、妇女运动、反核运动、或与本文的讨论最有关的人权抗争等。¹⁷ 人权运动向来以人权普遍化(一些人甚至会说成是人权全球化)为己任。《世界人权宣言》以及随后以同样精神制定的许多其他文书所确定的权利和自由制度超越了单纯国家关注领域即体现了这一点。推行从下至上式全球化运动的积极分子能为从上至下式全球化的辩论增添民主色彩，可使全球化冲破庄严肃穆的大公司会议室的范围，而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接轨。尤其重要的是，可协助人们挺身而出抵制从上至下式全球化可能引致的霸权趋势。¹⁸

10. 尽管如此，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盛行一时的主流看法显然是有偏见的。Arif Dirlik 将这类主流看法称作“全球化独裁”和“以全球化为中心”，他说，这类全球化定义对地点和地方存有偏见。根据这样的定义，全球性等于“……资本、空间、历史和翻天覆地的能量……”，而地方则被等同于“……地点、劳力、传统，并经常被等同于妇女、土著人民、农民以及‘仍偏守一隅的’其他

人”。¹⁹ 这也就意味着，后者根本无缘参加全球化辩论，其知识和实践无法用于建立真正全球化的当代世界。Dirlik 敦促重审这一带有偏见的看法，尊重他人的世界观，并调动自认与此问题相关的所有运动。²⁰ 事实上，需要再度作出承诺，促进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围绕并不妄图遏制技术发展带来的生产变革和革命性变革的议程进行讨论。²¹ 但关键是，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能忘记几十年来已被视为健康的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并得到履行的各项基本义务。技术和经济发展必须为全人类服务，尤其是，它不应忽视、歧视全球多数人口或有系统剥夺其机会。

二、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体制

11. 自 90 年代末以来，尤其是现在，国际性、而非国家性力量和机构的作用和地位在人权辩论中显得特别重要。一位学者曾指出，“……军国主义、经济调整以及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是发生侵犯人权行为的主要根源。”²² 换句话说，我们不应再注意国家的动态，而需注意国际领域的动态。这一说法只对了一半。在忽视主权、自决权或国家观念的力量的影响下，国家确实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削弱，关于这一点是没有多大疑问的。但这种关于国家作用的想法不仅是短视的，而且对国家过于宽容。卡多佐总统指出，随着全球化，目前国家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得多，他说：

“国家除了在执法、卫生、教育和外交政策领域行使传统职能外，现在还须满足人们在更大程度的公平和正义、良好的环境以及更尊重人权方面越来越大的需求。在要求更高的社会中，必须有更复杂的国家与之相称。组织良好、富有效力的国家较能满足这些需求，其中包括满足全球化带来的许多需求。另外，国家还须作好准备，以便在谈判全球化规则时能维护国家利益。”²³

因此，不应把国家置于一旁。较适当的看法是，国家在各种力量的影响下已发生巨大的变化。毫无疑问，可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找到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力量。

12. 显而易见，关于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制度应往何方向演变的辩论涉及许多层面的问题。新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声音最为洪亮，认为情况越来越好，²⁴ 并

认为应在国际范围内和国家一级减少被视为阻碍这些国际力量更迅速演变的障碍。以各种国际和区域文书为后盾，这一世界观越来越盛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是根据这一构想提出多边投资协定的，²⁵ 布雷顿森林机构自 80 年代以来也正是根据这一构想制定各项方案的。不过，这一问题并非那么黑白分明。Lourdes Benería 和 Amy Lind 指出：

“在贸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下，既会有赢家，也会有输家，因此，贸易的作用可能有好有坏。所以，关于贸易自由化的任何讨论，并不是采取“亲贸易”或“反贸易”立场的问题，事实上，要想进行实质性讨论，就需理解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性质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以制定适当的政策和采取适当的行动，尤其是弥补不良影响。”²⁶

上文的分析引发了若干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用于促进这些政策的现有机构是否注意到其活动可能会造成不良后果，尤其是在人权方面造成不良后果？我们首先审查在谈到国际贸易和全球化问题时往往备受指责的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

A. 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

13. 世贸组织于 1994 年才问世。尽管这一国际组织较年轻，但吸引了学术界和舆论界大量的注意力。在西雅图世界贸易部长会议期间爆发示威活动之后，在人们的心目中，与其他组织相比，世贸组织与全球化现象的关系最为密切。世贸组织制定的一整套原则是该组织的灵魂和行动指南，为与全球化有关的当代多数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自由贸易、开放市场以及降低关税等。与此同时，世贸组织的成立，无论从马拉喀什会议之后建立的贸易制度下所关注的问题的范围来看，还是从通过其具有约束力的解决争端机制处理不遵守贸易制度情况的角度来看，都无异于一场革命。²⁷

14. 世贸组织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是过渡性的，只对产品适用，而且大多数时间基本上只重视处理边境措施问题。²⁸ 1994 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列入了服务业、²⁹ 知识产权、³⁰ 政府采购、³¹ 投资措施³² 等新问题。将这些问题列入国际贸易执法制度的范围后，该组织权力大增，并引发了几个新的问题，如该组织与单个国家之间的关系、³³ 广泛的人权问题以及南北地缘政治差异问题。例

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北方国家的要求开放了市场，但北方国家显然却实行双重标准，坚持不开放本国的市场。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 Joseph Stiglitz 曾指出，规劝往往不起作用：

“发展中国家采取措施，开放了本国的经济和扩大出口，但却发现面临可观的贸易壁垒，结果，既得不到援助，又无法开展贸易。它们在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认为它们真在倾销产品的时候突然遇到倾销税问题，或在其拥有天然相对优势的领域(如农产品或纺织品领域)面临保护性或限制性市场。”³⁴

事实真相比这还要严重得多。世贸组织规则所依据的前提实际上极不公正，甚至带有偏见。这些规则一味偏袒已垄断了国际贸易领域的大公司的利益，³⁵ 设想从事贸易的所有国家享有平等的谈判权，而忽视了强大的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大部分贸易这一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规则所依据的自由贸易观念纯属无稽之谈。

15. 有人称世贸组织“……实际上体现了贸易和商业全球化。”³⁶ 但如果更认真审查一下该组织的情况，就能看出，虽然贸易和商业确实是该组织的主要重点，但它已将触角伸到其合理职权范围之外的其他领域。此外，即使其纯粹的贸易和商业活动也涉及重大的人权问题。更糟糕的是，世贸组织的成立文书很少(事实上只是非常间接地)提到人权原则。³⁷ 结果，对某些人而言，尤其是对南方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世贸组织就象是一场恶梦。³⁸ 另外，考虑到妇女大多被排斥在世贸组织决策结构之外，并考虑到世贸组织制定的规则大多漠视妇女权益，广大妇女从这一组织中并未得到什么好处。³⁹

16. 同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其他国际机构一样，世贸组织既有程序上的问题，又有实质性问题。世贸组织实行一国一票原则，并且其决定表面上须获各方的同意，这些因素可能会带来较公平的结果，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世贸组织可说是一个民主机构。⁴⁰ 但这一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该组织权力的外衣和实质上的不平等。国际人权联合会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无论是看一下解决争端程序，还是看一下履行协定机制或所选的谈判领域，均可看出世贸组织的结构大大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

家事实上被排斥在决策机制之外，无缘参与决策。另外，该组织未能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定问题”。⁴¹

在关于贸易自由化进一步目标的审议和谈判中，世贸组织极力抵制人们发出的要求透明的呼声。在西雅图，尽管发展中国家代表发出警告，并尽管示威群众在会议厅外面高呼口号，⁴² 但北方国家的代表仍立场顽固，将大多数代表排斥在外。最后，一点不奇怪，谈判令人失望，陷入了僵局。⁴³ 目前的格局仍然如此。更为糟糕的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资源和训练有素的人员，在世贸组织中一直没有多少谈判地位可言。⁴⁴

17. 令许多发展中国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有些人妄图把贸易、人权、劳工标准、环境等问题挂起钩来，尤其是以此为由阻挠发展中国家。在 2000 年 4 月 10 日至 14 日举行的南方首脑会议上，77 国集团通过的《哈瓦那宣言》在此方面立场坚定，宣称反对“……利用这些问题抵制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或提供援助和技术的一切企图。”⁴⁵ 迄今为止的将贸易与人权挂钩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原因如下。首先，这往往被发展中国家说成是实行新殖民主义。⁴⁶ 其次，北方国家一方面承诺实行真正民主的和尊重人权的国际制度，但一方面却极为片面地理解人权含义，⁴⁷ 并且不断在南北方国家关系中实行大量双重标准。一些国家从非常广泛的人权制度中挑出一系列大多主观的因素，将“人权”与贸易挂起钩来。⁴⁸ 换句话说，人权只是这些国家实现开放市场目标的投机工具。例如，在所提出的要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遵守和尊重之间为何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所推行的许多措施实际上有损逐步实现这类权利。但即使在将贸易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挂钩时，也有许多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国家主观利益压倒了其他因素。

18. 世贸组织许多措施的影响远远超出国际贸易问题的范畴。专利问题、尤其是植物品种和生命形式的专利问题是世贸组织带来的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⁴⁹ Vandana Shiva 指出：

“对某一物种的所有基因重组品种授于专利，而不管有关基因是何种基因，或如何进行转让，这可能会造成一位发明人控制我们农场和院中所种的植物。这无异于合法的经济盗窃行为，无数农民和科学家的研究转眼之间就可能化为乌有”。⁵⁰

这一措施可能会对粮食安全问题及与食物权的关系问题造成严重影响。另外，这纯粹是剽窃，把归整个人类的大自然遗产据为己有，其中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和技术先进的人得利。⁵¹

19. 世贸组织至少需要改革其审议程序机制，以提高包容性，使人们能听到不同的(尤其是民间社会)的呼声。更重要的是，它需要审查其本应解决的自由贸易这一实质性问题。Stiglitz 教授极为冷静地剖析了真正的贸易自由化制度的实质内容，他指出：

“但贸易自由化的议程、过程、结果必须平衡，并必须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不仅应列入发达国家有相对优势的部门(如金融服务部门等)，而且也应列入发展中国家特别感兴趣的部门(如农业和建筑业服务等)。不仅需列入发达国家感兴趣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而且也需处理发展中国家目前关注的或以后可能关注的问题，例如传统医学知识的产权或发展中国家市场上药品的价格等问题。”⁵²

世贸组织在西雅图未能做到以上几点，此后情况也无任何改观。在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之后，世贸组织领导人和在确定世贸组织新的贸易制度的基本内容上发挥主要作用的北方国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它们将设法改革。但正如一位观察家指出的那样，从该组织在西雅图会议之后的审议和言论来看，似乎其心态并无多大改变。⁵³ 所以说，世贸组织的问题远不止如何对待其任务授权的实质性内容问题。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多边投资协定一样，世贸组织必须认真重审其运作机制、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机构参与的作用和份量以及世贸组织与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关系等。换句话说，需要彻底审查整个贸易自由化制度，并审视这一制度真正平等的程度，使富国和穷国都能获益。世贸组织必须采纳人们就如何提高该机构开放度和透明度所提出的许多建议，改进内部民主，建立更公平和真正有益的国际贸易制度。⁵⁴

B.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机构

20. 同世贸组织一样，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布雷顿森林机构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并越来越密切的监督。事实上，与世贸组织相比，这两个机构早在全球经济基本特点的形成过程中就插手全球经济，而且发挥了更举足轻重的

作用。4 月份的示威游行表明，人们深深怨恨这两个机构。布雷顿森林机构不仅更深介入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关键事务，而且对基本人权造成的影响也要大得多，影响了自决权和尊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逐渐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尤其在卫生、教育和基本福利领域实现这些权利的能力。

21. 在这两个机构中，人们公认世界银行在设法克服遭人指责的许多问题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尤其在解决对雄伟项目的迷恋、对环境、土著和少数群体的关注以及性别问题上的麻木态度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⁵⁵ 世界银行力图向民间社会伸出手来，并宣布在 James Wolfenson 于 1995 年起担任行长以来，减贫已成为该行的主要目标。世界银行还积极设计旨在解决债务负担问题的机制，制定了重债穷国计划。进行所有这些改革方案的用意是，抛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指的是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为改革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实行一整套结构调整和经济自由化的震荡疗法措施。⁵⁶ 在人权领域，世界银行仿效开发计划署，也制定了一整套方针，将其活动与其自觉的人权义务挂起钩来。⁵⁷ 这些方针表明世界银行确实在考虑这一问题，但显然还远远不够。无论是减贫计划，还是重债穷国计划，基本构架仍然未变，也就是说仍有附加条件，仍在强制人们实行自由市场改革，这表明世界银行的改革措施走得还是不够远。⁵⁸

22. 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措施只限于通过井井有条的综合网址公布包括审计报告在内的信息，并改进国家和国际监督制度。⁵⁹ 货币基金组织以其组织章程限定它只关注经济性质的问题为由，很不愿介入关于其活动对人权影响的辩论。货币基金组织于 1997 年发表的内容广泛、但意思颇模糊不清的“良好施政”文件算是该机构在可能与人权有关的任何事务上走得最远的。⁶⁰ 货币基金组织编写这份文件的目的是想指出“……如果国家欲取得和保持私营部门的信任并进而为持久增长奠定基础，就必须实行较广泛的体制改革措施。”⁶¹ 关于该机构的这份施政方针文件，可发表两点意见。首先，该机构所关注的范围极为狭窄，只限于

“……财政部门的机构改革、预算的编制和批准程序、税务管理、会计和核计机制、中央银行的业务以及官方统计职能等问题。与此相类似，市场机制改革的主要重点应放在兑换、贸易和价格制度以及金融制度所涉问题上。在管制和法律领域，货币基金组织将主要在税务、银行部门的法规和建立自由和公平进入市场规则方面提供指导。”⁶²

货币基金组织极为重视所面对的有关国家的腐败和需要建立透明运作制度的问题。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名为“建议”，实为指令，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什么选择可言，也几乎没有任何活动余地。另外，这些方针根本没有提到该机构本身的问题。该机构也许是认为其采纳的制度和方法均是无可指责的，所以也就没必要提了。第二点，也许是更为关键的一点是，整个方针通篇未提“人权”二字。而实际上，人们公认宏观经济政策与人权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23. 在如何对待人权问题上，货币基金组织远远落后于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显然都有“民主缺陷”。领导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Helleiner 和 Oyejide 指出，这两个机构的管理方法“有问题”。我们认为，其管理方法事实上既不透明，又不道德。与挑选王位继承人一样，这两个机构的领导人也得从符合地区标准、甚至是种族血统标准的极少数所谓“王室”成员中选出。“按照惯例”，世界银行行长来自美国，而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主任则总是由欧洲人担任。货币基金组织执行主任 Michel Camdessus 在任职多年后于去年提早辞职，当时，由于美国最初支持 Stanley Fischer，而反对欧洲推出的候选人，接班工作陷入了小小的僵局。⁶³ 美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尤其是在非洲国家中)为 Fischer 拉票时所用的一个理由竟然是，虽然 Fischer 是归化入籍的美国人，不过他是在赞比亚出生的！这类做法暴露了非要借款国实行所谓“良好施政”的这两个机构的虚伪性。Helleiner 和 Oyejide 还指出：

“这两个机构在成立时，实行如此失衡的表决安排和不民主的领导挑选程序也许还有一定的道理，但到了今天，尤其是在这两个机构都通过贷款附加条件迫使借款国改进施政时，就很难为这些做法辩护了。”⁶⁴

实际上，如果追根溯源，一些危机可能是货币基金组织的附加条件迫使有关国家采取的政策造成的结果。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该组织仍岿然不动，仍在实行神秘兮兮的做法，权力高度集中，还一味推卸责任。最近，在东亚国家的货币在 90 年代末遭到冲击时，情况正是如此。事实上，国际金融机构一开始就把大部分责任推到有关政府头上，在描述危机原因时，动不动就用“……监督不力的”、“运作不良的”、“管理得很糟糕的”、“腐败的”和“政府管理的”等形容词，⁶⁵ 好象国际金融机构与这些问题毫无关系是的。⁶⁶ 而在几年以前，它们的说

法可是大不一样，它们当年对这些国家赞不绝口，称其是“老虎”、经济“奇迹”、“令人瞩目”。⁶⁷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来承认这些危机与其开出的药方有些关系，⁶⁸ 并特地评估了其中一些方案，且评估结果证明确实有缺陷，⁶⁹ 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组织愿意采取下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实行责任制。无论从构想，还是从实际做法来看，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事实上仍与危机前的做法几乎一模一样，这表明在构想方面或真正关注大多数人的困境方面，情况并无多大改观。该组织仍以今后身体会恢复和强壮起来为诱饵要他人今天吞下苦药。⁷⁰

24. 因此，在讨论多边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类似机构的责任问题时，透明度与责任感是最关键的问题。华盛顿的示威者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谴责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的。⁷¹ Smith 和 Naím 指出：

“人们在透明度和责任感方面提出的可行论点也同样重要。目前，任何权力机构要想长期维持下去的话，就必须获得被管理者的知情同意。全球化使人们获得了表示同意所需的信息，有时还向人们提供了拒绝同意的工具……但由于缺乏民主程序，国际机构颇为虚弱……难怪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不愿向比本国政府更无责任感(甚至更遥远的)组织效忠和将权力转交这些组织”。⁷²

显然，这些推行全球化的机构无论在各国开展的活动中，还是在内部结构和运作上，都未能以民主的、彻底的方式严肃处理人权问题。这些机构如果真的决心全面推动人权，那么就必须既重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又重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此外，这些组织需要遵循人权基本准则，且落实在行动上，体现在人们经常提到的透明度、责任感和参与程度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Joseph Stiglitz 因公开抨击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的许多政策和指责这两个机构过于推动改革和民主化而愤然辞职一事，就大力表明在这方面确实仍有问题。⁷³ 这一事件最恰当不过地透露出，国际金融机构尽管假装改革，但实际上仍在奉行“按我的指示办事，但不要象我一样行事”这一古老格言。

三、全球化、平等与不歧视

25. 作了上述分析后，我们现在可以具体探讨一下全球化与平等和不歧视之间的关系问题了。这两个概念是人权文书和实践的内容和精神实质的核心。《世

界人权宣言》以及其他人权文书明确宣布，人人平等，而且免遭歧视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禁止歧视的理由也很明确，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充实，以对付与人类历史同样久远的这一可恶做法的新的表现形式。禁止以种族、肤色、性别、宗教和民族为由进行歧视尤其重要。人们指出，事实上某些禁止歧视的规定已成为强制性法规，因此，即使在战争期间，也就是说在最容易找借口克减规定的时候，也不得克减这些规定。

26. 说不平等是由全球化造成的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令人遗憾的是，远在全球化被确认为国际独特现象之前就已存在不平等和歧视现象了。但只要审查一下统计数据，就一定能看得出全球化加剧了全球不平等和歧视状况。开发计划署以互联网为当今世界上创造和获得财富的一项主要指标，提出了谁在圈内这一关键问题。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全球化的“圈子”之外。这也就是说，在表面上越来越富足的世界里，不仅边缘化现象进一步加剧，而且贫困化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再问一下究竟遭遗忘的人属于哪一个肤色、种族或性别，那么就能看出全球化与不平等和歧视的力量之间的关系了。

A. 第二十一世纪全球不平等与种族主义概况

27. 审查一下在全球化过程中平等和不歧视这两项基本人权准则获得尊重的程度可能会引发一些严肃的问题。只要看一下被吹嘘为全球化“革命”基石的电信业的主要内容，就看得出当代全世界不平等现象的性质。Smith 和 Naím 指出，令人遗憾的是，电信业深受地理、性别、收入和语言等因素的影响。⁷⁴ 稍稍看一下全球化在从前属苏联阵营的一个国家中的影响，就可明显看出这些制约因素：

“全球化对所有罗马尼亚人影响的程度或方式并不一样。在罗马尼亚，只有六个城市有国际机场，多数农村人看不到有线电视，而且根本不知道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截至 1996 年为止，罗马尼亚吸引到的一半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了布加勒斯特市。主要由于许多跨国联系的费用，罗马尼亚中产阶级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大。……对 Transylvania 的农民或 Târgu Frumos 的小店主来说，手机和肯德基炸鸡店中的快餐太昂贵了。”⁷⁵

这段话阐述了在全球化方面的城乡差异。通常还存在穷富差异。比如在非洲大陆，绝大多数的人生活在农村，生活极为艰难，只能勉强糊口，全球化事实上并未能改善他们的处境。因此，以放开市场、减少贸易壁垒和清除保护主义壁垒为特征的全球化进程并不能保障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

28. 全世界的合法工人以及其他工人对全球化的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可是即使对这些人来说，全球化究竟带来了什么好处显然仍是问题。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虽然明显靠移民工人维持和运作，但发达国家承认或奖励这类人的程度仍大有商榷余地。一位作家指出，移民(尤其是各类家庭工)已成为欧洲和北美工业化国家中的“无形之国”，⁷⁶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常被吹嘘成全球化一大好处的越来越高的一体化程度并没有为众多的移民工人带来任何好处：

“在过去几年中，随着欧洲统一市场的逐渐形成，(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公民的流动性越来越强，而移民工人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不能参加地方和国家选举，在一些国家中不能成立政治团体，而且往往不能担任公职。但事实上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经济越来越依赖廉价、灵活的移民工人。移民工人得不到保护，其权利往往既得不到接受国法律的保护，也得不到原籍国法律的保护……”⁷⁷

我们还可指出的是，其中绝大多数人不是白种人，这明显是一个种族歧视问题。从统计数字来看，有色少数民族(无论是土著还是移民)经常受到怀有种族偏见的警察袭击并遭歧视，这显然不是偶然的事情。事实上，在这些国家中，许多有色人对种族主义袭击事件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⁷⁸

29. 全球化不仅加剧了南北之间惯常的不平等状况，而且也恶化了北方国家中的不平等状况。而这些国家本应是全球化的主要受惠国。⁷⁹ Stephen Small 阐述了 90 年代联合王国黑人的处境，他指出，黑人面临的许多问题依然如故，只是全球化改变了问题的形式，使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而已。⁸⁰ 他只分析了英国的情况，但实际上令人遗憾的是，以下分析也同样适用于越来越多的欧洲和美洲国家：

“带有种族色彩的暴力以及其他形式的侵权行为不断升级。在就业和教育领域存在相当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另外，警察的种族主义恐吓行为

也很严重。国家以及雇主表面上赞成机会均等，但由于拖延不定和相互推诿，实际上并未做到机会均等。”

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矛盾是，一方面财富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不平等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这一矛盾在全球化现象对一般性别关系问题以及妇女处境的影响上表现得最明显不过了。

B. 全球化、男女关系与妇女境况

30. 在饱受全球化影响的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妇女的处境显然很令人关注。很少有人会否认，一般男女关系以及妇女的人权问题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各种国际会议和宣言的推动下，最重要的是，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推动下，在尊重和确认妇女的人权方面，在世界各地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虽然无疑取得了许多进展，但仍有大量事情要做。⁸¹ 全球化现象使促进妇女权利工作变得更为复杂，在经济领域以及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尤其如此。

31. 在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的国家中，大量妇女进入了就业市场。据联合国的一项调查，“全球化带来的工业化既与出口的推动分不开，又与妇女的推动分不开，至今已成通例。”⁸² 1996年，在20岁至54岁年龄组中，参与经济活动的妇女的百分比接近70%。⁸³ 在出口导向的工业部门中就业的妇女比例最高。在出口加工区和经济特区以及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利用廉价劳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情况尤其如此。⁸⁴ 在需要不熟练至半熟练劳工的所谓“轻松”行业中，例如在服装、鞋和玩具制作、数据处理和半导体加工行业中，投资者偏好女工。⁸⁵ 这类行业为劳动密集型，面向的是服务业，工资很低，所以，据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称，在全球化重压下，妇女深受制约。⁸⁶

32. 在经济自由化进程的影响下，非正规部门飞速发展，其中的女工人数越来越多。在非正规部门中，妇女更易将有偿工作与家务结合起来，所以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妇女人数往往高于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妇女人数。⁸⁷ 只要稍微探究一下，就能知道为何有些人将据称温顺的妇女劳力理想化。在许多国家中，出口加工区的工人几乎无法成立工会，也无法进行集体谈判。一些国家不惜一切代价竞相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完全减免或放宽了现有的国家劳工保障规定。⁸⁸ 这类行动

当然完全背离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1998年)所载的有关标准。

33. 非正规部门的发展还意味着在该部门就业的人享受不到就业的好处和保护机制。⁸⁹ 由于男子失业使通常的家庭收入减少,再加上市场需要廉价劳工,大量妇女进入了劳动市场。找不到工厂的正式工作或由于家庭情况无法在工厂做工的妇女不得不去劳动条件比出口导向行业还要糟糕的非正规部门干活。跨国公司也发现分包和雇用临时工更有成本效益。结果,妇女只能得到较差的工作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业不足似乎与纯粹的失业同样严重。⁹⁰

34. 多边机构在实行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一揽子计划时提出附加条件,要发展中国家实行结构调整计划。放松管制和国营企业私有化是结构调整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Lim指出:

“放松对劳动市场的管制是结构调整计划的一个重要特点。一种是明确放松管制,即通过立法手段消蚀或放弃正式规定,另一种是非明确放松管制,即通过并不认真执行或有系统绕过的方式降低现有规定的效力。放松管制的理由是,政府通过公共部门工资和就业政策、确定最低工资和就业保障规定等措施过度干预劳动市场,严重阻碍了调整工作,因此应消除或放松管制。放松管制可能会为妇女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但这类就业往往可能条件较差。问题是可否由市场几乎完全自由确定女工的价格和妇女就业条件。”⁹¹

Lim还指出了在一味追求相对成本优势过程中贸易自由化与喜用廉价劳工(几乎总是妇女)之间的因果关系。⁹² 另外,在竞争极为残酷的全球经济体制中,世界各国、尤其是按地缘政治划分属于南方的国家为竞相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不得不放宽劳工标准,修订税则,并普遍放宽了审查和监督标准。发展中国家纷纷“向下看齐”,陷于恶性竞争,想通过逐渐降低劳工标准提供最好的投资环境。⁹³

35. 就业数目增加了,但工作条件的质量却下降了,这一现象在出口加工区尤为明显。据估计,1976年,发展中国家设有24个出口加工区,而到了上世纪末,共有93个发展中国家设有出口加工区。⁹⁴ 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大韩民国和斯里兰卡等少数国家中,出口加工区成了妇女就业的主要场所。在有些地方,妇女满足了出口加工区80%的劳工需求。⁹⁵ 另外,在国内外移民工人大军中,妇女

人数最多。大量往往年轻且未受多少教育的农村妇女涌入城市求职。在一些国家中，妇女大多流入城里的出口加工区和特别经济区。这些妇女处境艰难，很易遭受经济剥削和性凌辱。她们往往愿意在男人和城市贫困妇女都不愿接受的恶劣劳动条件下干活。

36. 尤其是，在亚洲，西亚和东南亚等地的大量妇女涌到中东地区作工，结果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例如，据估计，赴亚洲国家的菲律宾移民工人的女性与男性比例为十二比一，印尼人的比例为三比一，斯里兰卡人的比例为三比二。⁹⁶ 其中许多妇女当佣人、裁缝、护士、店员、饭店服务员，还有的在娱乐业(往往是色情业)谋生。⁹⁷ 虽然多数妇女比在本国时赚的钱要多，但所在国的劳工标准以及社会保障和人身安全机制看来很糟。女工所在国往往不遵守与移民工人、尤其是与女工有关的甚至最低限度的劳工标准。而原籍国由于在经济上严重依赖移民工人汇回的资金，故不敢要求移民工人所在国为这些工人提供公正的劳动条件和保护，这进一步恶化了这类工人的处境。⁹⁸

37. 在农业部门，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的推行、贸易自由化和跨国公司在与农业相关行业中的活动也对妇女造成了不利影响。某些国家由于偏重种植出口作物，妇女原来倒一直有农活干，而现在却不得不去作季节工。在这种新的经济环境下，自给自足的耕作方式受到严重影响，迫不得已，妇女只好去作季节工。⁹⁹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指出，由于季节工收入微薄、自给自足的耕作方式的消失、工业污染越来越严重以及往往由跨国公司供资的大型商业投资项目占地越来越多，粮食保障和农村穷人的健康遇到了严重问题。¹⁰⁰

38. 全球化还影响了并未进入正规部门的妇女的命运。自 80 年代初以来，在多数非洲国家中风行一时的结构调整计划对在全球化产品和服务市场之外谋生的妇女造成了不利影响。在“效益”、“稳定”和“成本效益”的招牌下，非洲妇女成了牺牲品，在调整进程中深受其害，并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不幸的是，后来为“缓解”这些妇女境况而设立的所谓社会“安全网”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危机。

39. 联合国秘书长指出，不利的劳动条件是导致妇女日益贫困化的一大因素。¹⁰¹ 按理说，对女工的需求将会提高女工的讨价还价能力及其工资，但看来实际状况完全相反。有些行业很易迁移，可以轻易把生产程序或部分生产迁到投

资环境“更好的”国家中，也就是迁到劳工标准较低且管制较松的国家中。女工即大多集中在这些行业。由于这些轻工业容易搬迁，大大抑制了工人提高工资的能力。这一现象既影响到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也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例如，曾有人指出，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后，美国的雇主以将生产迁到国外劳动力较便宜的地方为由进行要挟，挡住了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呼声。¹⁰² 因此，在此方面，必须重视《北京行动纲领》中关于审查和修订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呼声，确保促进妇女权益。¹⁰³

40. 秘书长认识到，在处理消除贫困、尤其是消除妇女贫困问题过程中，“应在财政政策中避免削减卫生、教育和技术培训支出，*即使在预算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也都应避免减少这方面的支出……*。在国际上，发展援助的一项主要目标应是支持国家在持久的人力资本形成方面的努力。在此方面，在有关国家中实行 20/20 计划尤为有用。”¹⁰⁴ 秘书长在报告中确认高速增长本身并不能保障公正分配或社会保护，并强调需要建立社会安全网，使人们渡过缓慢增长和危机(例如亚洲危机)造成的困境。¹⁰⁵ 有意思的是，货币基金组织在引发 90 年代末亚洲危机方面起了相当有害的作用，而且只承担了一小部分的责任，但该组织与其他机构一道却协助秘书长编写了这份报告。

四、全球化与适用的人权框架

41.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全球化对人权的享受造成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影响到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生活在内的人类生存的各方面内容。对某一类人权(例如经济权利)的不利影响定会对其他权利产生连锁效应。这进一步加强了《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的有关原则，即人权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和相互关联的”原则。¹⁰⁶ 今天，必须按这项基本原则看待国际人权义务。《联合国宪章》确认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来为经济和社会进步和发展创造条件与促进和保护普遍人权之间的重要联系。¹⁰⁷ 非常重要的是，根据《宪章》的规定，会员国负有法律义务，须在联合国合作下，采取单独或联合行动，提高生活水准，促进充分就业，为经济、社会进步和发展创造条件，并促进普遍尊重和遵守各项人权。¹⁰⁸ 会员国集体或单独采取的背离这项承诺的行动显然违背《宪章》，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违背了强制法准则。

42. 联合国坚信各项人权是不可分割的，这一点反映在《世界人权宣言》中。这项文书确认了享受适当生活水准权、社会保障权、工作权、享受公正和有利的工作条件权、受教育权、以及惯常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意味深长的是，《世界人权宣言》还确认人人有权在可以充分实现《宣言》所规定的各项人权和自由的国际社会中生活。¹⁰⁹ 此外，《世界人权宣言》还确认不得将其中的任何内容解释成有权取消所规定的任何权利。¹¹⁰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规定。这两项公约已获许多国家批准。极为重要的是，这两项公约确定了国家机构关于保护各方面人权的具体法律义务。

43. 现在已不能再将国家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的义务的性质与其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义务的性质区分开来，这一点已越来越清楚了。按传统观念，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只涉及被动义务，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则较为复杂，国家须主动腾出资源促进这些权利。联合国人权机制驳斥了这一正统观念。据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解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障的某些权利也涉及主动义务，生命权显然就是如此。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关于第6条的第6号(16)一般性评论¹¹¹中，对生命权作出了广义的解释，规定缔约国需采取主动行动，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预期寿命，并采取措施消除营养不良现象和流行病。¹¹²

44. 由于全球化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对脆弱社会阶层的不良影响，这两项《公约》规定的许多权利遭到侵犯，尤其是严重影响了生命权、免遭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自由、免遭奴役的自由、平等权和免遭歧视权、享受适当生活水平权(包括适当的食物、衣物和住房权)、维持高水平的身心健康权、工作权和享受公正和公平劳动条件权、结社和集会自由、集体谈判权等基本内容。在全球化的威逼之下，发展中国家往往迫于无奈采取了不利措施，对这些权利的行使造成了不良影响。结果，有些国家即使愿意改善本国的人权状况，也无法履行其国际人权义务。关键问题是：我们能听任国家机构和私营机构操纵的国际经济力量蔑视国际人权法并冲击整个人类吗？

45. 有人认为不能将侵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责任推到国家或其他机构的头上，而现在这种说法已受到人们大力抨击，因为无论从实际经验来看，还是

从概念上来看，这都是一种错误的论点。根据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2 条的传统解释，《公约》只规定了非常松散的国家义务，在确定国家如何以及何时调配资源以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国家有绝对自由权。人们持这一观点的通常理由是，第 2 条规定缔约国需采取行动，“尽最大能力”“逐渐实现”所述的各项权利。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关于这项《公约》规定的缔约国义务性质的一般性评论¹¹³中宣称，《公约》第 2 条规定了具体的法律义务。缔约国至少有义务有效利用现有资源达到每项权利的最低标准。由专家小组制定的《关于落实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林堡原则》(1986 年)和《关于侵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问题的马斯特里赫特方针》(1997 年)在此项一般性评论的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规定。这两项文书在联合国论坛上越来越获认可。《马斯特里赫特方针》确认了尊重、保护和履行权利的义务。¹¹⁴ 以此衡量，如果国家行为不符合这些义务，或在实现权利方面未能达到所需的水平，国家即须为侵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述各项权利负责。¹¹⁵ 行为或不行为都可能会引致侵权行为。¹¹⁶ 《马斯特里赫特方针》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看法一样，也确认缔约国“最低限度的核心义务”。¹¹⁷ 不管资源是否有限，也不管是否受到其他限制，均须履行这类核心义务。¹¹⁸ 在确定一缔约国是否“尽最大能力”利用“其现有资源”时，应看一看该缔约国是否公平、有效利用了现有资源。¹¹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马斯特里赫特方针》确认，如果国家管辖下的非国家机构(如跨国公司)剥夺了个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而国家在管治这类行为上有所失职，即构成国家的侵权行为。¹²⁰

46. 两项《公约》确认，人民的自决权是享受其他权利的关键。¹²¹ 人民对其自然财富和资源享有主权是人民自决权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两项《公约》第 1 条第(2)款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人民自己的生存手段”。另外，大会通过了“关于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决议，¹²² 宣称国际合作的目的是“……推动 [发展中国家] 独立的国家发展，并应在尊重其对自然财富和资源的主权的基础上开展这一合作……”。

47. 国际经济关系以及主导这些关系的政策不得以自由经济为名背离国际法规则，而须符合国际法规定，尤其是确认国家主权平等、人民自决权和尊重人权这些现代国际法的基本规定。国家和多边机构负有直接义务遵循这些准则，并有

义务确保其管辖下的私人经济机构和个人不违背和公然侵犯这些权利。Diller 和 Levy 在阐述强制童工形式问题时指出, 如果涉及基本人权规则, “……根据国际法规定, 条约义务(如贸易承诺)必须符合这些规则……”。¹²³ 这些义务超越童工领域的范围, 可适用于涉及贸易与人权法关系的一切方面。

48. 就审查全球化对人权的影响而言, 发展权同样重要。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大会上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¹²⁴ 《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确认人是发展进程的核心, 并且应是发展权的积极参与者和受惠者。¹²⁵ 《宣言》确认发展的多面性, 其中包括人类生活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¹²⁶ 开发计划署制定的用于切实评估发展水平的受到人们普遍赞赏的人类发展指数体现了这一立场, 关于社会发展的《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1995 年)也体现了这一立场。¹²⁷ 从这些立场来看, 发展进程的目的是促进人民充分行使所有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权利。

49. 人们越来越怀疑单靠经济指数衡量发展的做法, 因为这并不能反映实际状况, 尤其是收入分配不均和生活水准不均状况。¹²⁸ 这样做忽视了发展为人服务的宗旨以及发展、人权、和平之间的重要关系, 并且忽视了赤贫状况以及其他人权遭到剥夺定会引发激烈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如果忽视发展进程以人为中心这一核心前提, 任由自由化肆虐, 就一定会导致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 进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动乱。《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一面确认全球化的益处, 一面又发出警告:

“与此同时, 随着迅猛的变化与调整, 贫困、失业和社会解体现象越来越严重。对人民福利的威胁(如环境风险)也已全球化。另外, 世界经济的全面变化深刻影响着各国社会发展状况。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掌控这些进程和威胁, 为民兴利除弊。”¹²⁹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于 1998 年 5 月就全球化问题发表的声明表达了同样的意思,¹³⁰ 呼吁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设法衡量其政策对享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影响(即社会监督), 并相应修订这些政策。¹³¹

50. 现行国际法主要为国家和政府间组织规定了尊重人权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 不应忘记《世界人权宣言》呼吁每人和每个社会机构采取行动, 确保普遍和有效实现《宣言》所确定的各项权利。¹³² 《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指出, 这不光

是国家的事情，社会与国家均需努力促进和保护人权。事实上，第 29 条第(1)款宣称，“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因此，所作所为对广大人民的人权产生严重影响的私人机构或个人不得推卸在维护国际人权标准方面的责任。由国家设立的像多边机构和世贸组织等机构更不能推卸根据国际法所应承担的责任。

五、联合国机构、机制的作用和地位

51. 联合国近些年表示已认识到需带头应付全球化挑战。科菲·安南秘书长经常重申需在市场力量与社会需求之间进行平衡，使全世界人民过上平安生活。他在 1999 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阐述了为利用全球化的最佳成果而缔结“全球契约”的必要性，并在世贸组织于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需重视全球贸易制度中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他指出，必须首先确保人类安全，然后才能保障市场繁荣。他最近围绕千年期首脑会议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于 2000 年 4 月分发)专门阐述了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审视国际和国家管理问题的必要性，其中指出，新的管理观念不仅应考虑到全球化在改善人类生活方面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而且也应考虑到人类安全面临的威胁。这份报告认识到人民期望联合国今后以人权为中心发挥有效作用，并指出，免遭匮乏的自由、免遭恐惧的自由以及确保可持续的未来是联合国今后活动的三个关键要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也强调企业应以人权为中心。¹³³ 她就西雅图会议发表评论说，“人权无疑是个基本问题。我们需要看到更多的公司遵循人权准则，并承担落实这些准则。”

52. 但对联合国各人权机制的调查表明，各机构对全球化影响人权问题的重视程度并不一样。¹³⁴ 总的说来，根据《联合国宪章》设立的机制更为关注将全球化问题列为议程上的核心问题。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人权委员会以及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发起了若干行动，调查全球化现象所涉各方面的问题以及对人权造成的影响。经社理事会与多边机构和专门机构讨论和磋商了全球化对发展与贫困的影响问题。¹³⁵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近些年也采取了几项行动，重点处理了贫困等问题。小组委员会多年来一直强调需要重视人权不可分割准则，并强调应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纳入联合国人权领域的活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化恰恰反映了各项人权不可分割的特点。除了本份研究报告之外，小组委员会还委托

其他人士编写关于食物权、饮水权、收入分配问题和跨国公司的作用等研究报告。根据这些研究报告，有人建议设立机制处理经济活动自由化造成的问题。小组委员会在第五十一届会议上设立了跨国公司工作方法和活动问题会期工作组。¹³⁶ 正酝酿根据收入分配问题研究报告中的一项建议设立主要处理经济不平等现象的社会论坛。¹³⁷

53. 在根据条约设立的人权机制中，就努力理解和监督经济自由化对其本身工作的影响而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工作最为出色。它为确定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征求了多边机构、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它与有关各方就全球化及其对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影响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在磋商后就此问题发表了一项声明。¹³⁸ 它在声明中称关注全球化对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不利影响，并呼吁国家以及多边机构在经济决策过程中更为重视人权问题。它认为，全球化本身并不否定人权，委员会关注的是在没有相应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任由市场力量自由运作的问题。它在 1999 年 11 月西雅图世贸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上大声疾呼，再次阐述了这些令人关注的问题。委员会确认“政府对促进和保护人权负有首要责任”，敦促世贸组织成员国在会上重视人权问题。¹³⁹ 它还指出在监督国家履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各项义务的过程中，它越来越意识到国际经济政策和惯例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的能力。¹⁴⁰

54. 委员会最近关于食物权的一般性评论似乎触及全球化过程中的食物保障问题。¹⁴¹ 值得注意的是，它指出，除了缔约国有义务适当管制私人机构的行为之外，私人机构也有责任促进实现充足食物权。它接着还规定，“国家和国际私人企业部门应根据政府与民间社会共同商定的有利于尊重充分食物权的行为守则开展活动。”¹⁴² 另外，它呼吁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制定贷款政策、信贷和结构调整方案时重视保护食物权。¹⁴³ 在保护人权方面，这一条约机制既重视多边机构的责任，又重视私人机构的责任，这是目前的经济环境中一项极有意义的举措。

55. 大多数其他人权条约机构也越来越关注与其职权范围有关的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现象。例如，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审查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提交的定期国别报告时，极为关注明显的贫困女性化现象以及经济

政策对妇女权利的影响。¹⁴⁴ 但迄今为止该委员会似乎并未直接面对全球化问题。人权事务委员会也是如此。关于男女权利平等问题的第 28 号一般性评论并不太注意全球化过程中贫困的女性化、不断下降的社会指数和男女就业不平等等问题。一方面，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根据任务授权当然应更重视全球化问题，另一方面，考虑到已获公认的人权不可分割准则，其他人权机构按理说也应同样重视全球化带来的人权问题。另外，正如秘书长在向千年首脑会议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无可辩驳的是，全球化已成为决定人类生存质量的最重要因素。毫无节制的经济自由化如果得不到及时抑制，可能会对人权造成极大损害。因此，联合国各人权机构应十分重视自由市场力量对人权的影响，并设立适当的机制处理所造成的在享受人权方面的障碍，尤其是处理与各自职权范围有关的人权问题。

56. 为了进一步支持采取这些措施，联合国若干专门机构也已涉足全球化及其对各自任务授权的影响问题，例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劳工组织、儿童权利委员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开发计划署 1999 年人类发展报告雄辩地指出，光是靠强迫国家放开经济是无法获得全球化经济好处的。¹⁴⁵ 为促进尽量利用这些好处，必须制定一系列政策。政府必须确保制定社会发展与保护、减贫、收入分配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合理政策，另外，还须制定周详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建立相应的机构以确保经济的合理管理。如果做不到这几项，就谈不上持久的和可持续的发展。另外，如一波接一波的金融危机浪潮所示，为了减缓变化无常的市场力量的冲击，必须实行合理的社会政策。¹⁴⁶ 报告还呼吁调整全球管理工作的方向，确保国际谈判的公正性，并在全球管理工作中以人的发展和人权为核心。¹⁴⁷

57. 国际劳工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对全球化现象持审慎态度。它于去年通过了《关于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约》(《第 182 号公约》)，以对付毫无节制的经济开放政策对儿童造成的影响，并消除一切形式的有害童工做法。

¹⁴⁸ 劳工组织总干事在 1998 年与世界银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阐述了劳工组织为何关注全球化现象：

“我们共同谋求在全球化过程中就业机会稳定增加，这是劳工大众及其家庭享受全球化好处的主要途径。要想在世界各地提高经济保障程度和实现更高等度的平等，就必须有高就业增长率。围绕这一点开展有效

的社会对话显然是有好处的，可以通过这一途径探讨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现实的，并调动人们广泛支持必须采取的措施。”¹⁴⁹

58. 贸发会议在全球化问题的辩论中似乎并无多大影响力，但其工作对联合国对付这一现象是极为重要的。¹⁵⁰ 贸发会议一直尖锐批评布雷顿森林机构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并率先审查了亚洲危机的原因，而并不是一味指责政府。但令人遗憾的是，其许多工作并未能持续下去或被纳入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的工作中。如贸发会议秘书长经常指出的那样，造成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也许是，贸发会议缺乏任何谈判权，只能发挥技术援助、分析和建立共识的作用。¹⁵¹ 在今年 2 月于曼谷举行的贸发十大上，贸发会议在债务、资金和金融结构方面的职权获得了加强。考虑到这一点，并考虑到它与民间社会的积极协作，贸发会议无疑是联合国系统中进一步慎重处理全球化问题的理所当然的协调机构。¹⁵²

59. 联合国系统的一些组织和专门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等)也开展了有关工作。这些工作是联合国通盘处理全球化现象工作的一部分。¹⁵³ 虽然一些机构(如儿童基金会在处理孟加拉国水井砷中毒问题上的表现)¹⁵⁴ 存在责任和透明问题，但它们可以相互协作，同心协力，一致、全面地对付全球化现象。

60. 相当明显的是，重视全球化对人权影响的各人权机构和专门机构得到了监督和熟悉全球经济趋势的非政府组织的大力协助。这些非政府组织推动了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并促进重点处理了有关问题。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适当承认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它指出：“在国际决策上政治空间的开拓大多是与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工作分不开的。”¹⁵⁵ 必须确认和促进民间社会的关键贡献，以推动联合国继续就此问题开展工作。

61. 尽管联合国明确关注与全球化有关的各项问题，并尽管这些问题涉及联合国几方面的工作，但联合国全面处理这一问题的程度仍受到许多限制。最明显的限制是，联合国并不参与关于制定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政策的谈判和真正决策过程。其次，联合国及其机构(如开发计划署)试图与大企业和多边机构合作的一些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大量关注。¹⁵⁶ 大企业和多边机构可能会利用这类挂钩合作，对联合国信奉的、并继续不懈追求的理想和原则一味敷衍。另外，考虑到挂钩企

业和多边机构的金融实力和政治实力大得多，联合国有可能成为输家。¹⁵⁷ 因此，显然需要预先确定这类关系和安排的基本原则，并须明确纳入人权问题。

六、结论与建议

62.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相当明显的是，全球化现象、进程、传播体制及其多面性对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意味着需要认真重构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政策与工具，并且在重构过程中不再把人权问题当作是制定政策和运作机构时微不足道的因素。换句话说，极需将人权直接纳入辩论以及制定政策者和掌控站在最前面推动当代社会进一步全球化机构者的政策考虑，其中应特别强调与平等和不歧视有关的问题。

63. 一些人(尤其是全球化的主要受惠者)大声疾呼，称需要制定国际经济规则，尤其应重点解决侵犯版权、贸易制裁和保护大量外国投资等问题。本着这一愿望，布雷顿森林机构达成了《华盛顿共识》并制定了结构调整计划。经合组织则试图订立多边投资协定，并最终成立了世贸组织。毫不奇怪，多数这类要求是由已在很大程度上从全球经济目前的不平等状况中获得好处者提出的。¹⁵⁸ 现在需要采取较平衡的做法，确保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遵循人权准则。人权法高于所有其他国际法，这是一项不容偏离的根本准则。为了努力实现这项目标，必须对风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分析体系、尤其是现有体制中盛行的紧缩措施和惩罚性的附加条件发出重大挑战。另外，还须从人权角度进一步审查现行的债务减免和减贫措施。

64. 没有多大疑问的是，妇女几乎无缘参与制定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制度。事实上，在世贸组织和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机构中，女职员人数仍严重偏低。此外，人们很少尝试从性别角度分析这类组织的活动，其内部分析就更少了。因此，极需在推动正规化和全球化的机构中实现性别平衡。此外，还极需从性别角度分析全球化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的影响。

65. 相当明显的是，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规则急需改革。同时，从本报告中的分析来看，目前负责就全球化进程制定规则的机构也需改革。¹⁵⁹ 在改革中必须解决与决策、谈判、解决争端以及贸易和投资政策审查的参与和透明度有关的各项问题。还必须解决领导人、招聘工作和包容性问题。在这项审查工作中

需要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现行做法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人权法的基本规定？¹⁶⁰ 此外，还应建立有关机制负责内外评估和调查申诉，如设立调查专员。这些改革工作的关键是，必须倾听许多非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的呼声。这些机构和团体挺身而出，代表整个人类发出不满的吼声，抨击全球经济秩序四处蔓延、但却并未为大多数人带来多少福利的状况。

66. 小组委员会已着手制定一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草案。同样，我们现在也应设法制定关于全球化过程中主要机构基本人权义务的准则。这些准则不仅应适用于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制度，而且也应适用于实行这些制度的机构，其中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世贸组织、区域组织(如经合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等)以及负责促进和管制国际、区域贸易、投资和金融的一系列其他机构。其中还可建立有关框架，使这些机构能着手评估对人权的影响，能在开展活动前评估其活动对人权的影响。

67. 尽管联合国许多机构和专门机构相当积极地参与处理全球化问题，但仍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看来并未深深参与解决这一问题(尤其是其人权影响)的组织，例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应认真、深入地处理这一问题。此外，还应在联合国系统内，并跨越机构界线，与多边机构和世贸组织进行更多的跨机构对话。开展这类对话的根本目的是制定基本人权准则，以指导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的活动。

68. 考虑到全球化专题的范围非常广泛，并考虑到本份初步报告所涉的若干问题尚需进一步审议，建议仍由本特别报告员负责这一专题，编写一份最后报告，并向小组委员会和委员会下届会议提交这份报告。

注

¹ This paper has been writte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Rights, the University of Colombo, the Nadesan Centre and Shalini Perera, all of Colombo, Sri Lanka. It has also benefited from interaction with the pioneer students on the joint African LL.M in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zation programme. Rose Ssengendo at Makerere University, Uganda, and Margot Solomon of Minority Rights Group (MRG), London, also provided valuabl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support for the study. The authors express their gratitude.

² Sub-Commission decision 1999/102. The Special Rapporteurs are aware that no discussion of globalization can omit consideration of the issue of TNCs - regarded by many to be the “engines” of globalization. In order to avoid duplicating the work of the Working Group, however, this preliminary report does not cover TNCs in any great depth.

³ The Bretton Woods agencies compris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and the World Bank family, made up of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IDA), and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MIG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e attempt to create an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ITO) as part of the Bretton Woods agencies in the post-war period was unsuccessful, which is why the world was stuck with the much looser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See, John H. Jackson, “Fragmentation or Unifica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olitics, vol. 31, No. 4 (1999), at pp. 826-827.

⁴ See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TO, signed at Marrakech, Morocco, 15 April 1994. Also see resolution 1999/30 of the Sub-Commission.

⁵ This may be because - in the words of one scholar - globalization “...involves arguably the most fundamental redesign of the plane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rrangements since at leas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ee, Jerry Mander, “Facing the Rising Tide”, in The Case Against the Global Economy: And for a Turn Toward the Local, (Jerry Mander and Edward Goldsmith, eds.) Sierra Club, San Francisco, 1996, at p. 3.

⁶ Last year’s Reith Lectures presented by Sir Anthony Giddens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were exclusively devoted to the issue. The 2000 lectures were devoted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obvious links to the topic. See especially Vandana Shiva, “Globalization and Poverty” (accessed on 13 May 2000 at: http://news.bbc.co.uk/hi/english/static/events/reith_2000/lecture5.stm).

⁷ The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was focused on globalization, and at the Group of 77 (G-77) South Summit in April 2000,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meeting and the final declaration were devoted to the issue. See,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and the Havana Programme of Action (accessed on 21 May 2000 at: <http://www.g77.org/summit/ProgrammeofActionG77Summit.htm>).

⁸ See, "Globalization and Human Rights," (accessed on 6 May 2000 at: <http://www.pbs.org/globalization/home.html>).

⁹ Ibid.

¹⁰ One scholar has even gone so far as to argue that globalization is a new human right! See Michael D. Pendleton, "A New Human Right: The Right to Globalization",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22, No. 4, pp. 2052-2095.

¹¹ For a good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Seattle conference see, Miloon Kothari and Peter Prove, "The WTO's 3rd Ministerial Conference: Negative Impressions Mask Positive Developments in Seattl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8 January 2000).

¹² See Arie M. Kacowicz, "Region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ism: Convergent, Divergent, or Overlapping Alternatives?"

¹³ This point has come to the fore in the debate about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especially in the discussion over the issue of patenting life forms such as "Dolly" the artificial sheep. It was a point taken up by the Prince of Wales and the discussants in the final roundtable discussion of the 2000 Reith Lectures. See, <http://new.bbc.co.uk/hi/english/static/events/reith2000/lecture6.stm>).

¹⁴ See Fernando Enrique Cardoso,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ublic Address to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ohannesburg, 26 November 1996, at pp. 5-6.

¹⁵ This point is made very clearly by Bonnie Campbell, "Canadian Mining Interests and Human Rights in Africa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CHRDD) Working Paper (accessed on 6 May 2000, at <http://www.ichrdd.ca/PublicationsE/globAfrCamp.html>).

¹⁶ Paul Streeten,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vol. 42, No. 3 (September 1999), at p. 11.

¹⁷ Some may describe these as "counter-globalization" movements, b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such as the Internet) by both sides, for example, is apparent. See,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Globalization: What's New? What's Not (And So What?)", Foreign Policy (2000).

¹⁹ Arif Dirlik,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Development, vol. 41, No. 2 (June 1998), at p. 7.

²⁰ Ibid., at pp. 11-12.

²¹ Thomas Wallgren, "Political Semantics of Globalization: A Brief Note", in Development 42/2 (June 1998), at p. 32.

²² Anne Orford, "Contesting Globalization: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Future of Human Rights" in Transnational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8, No. 2 (1998), at p. 173.

²³ Cardoso, op. cit. at note 14, p. 5.

²⁴ See, for exampl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pen Markets Matter: The Benefit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1998).

²⁵ The Special Rapporteurs extensively examined this issue in their report presented at the fifty-first session of the Sub-Commission (see E/CN.4/Sub.2/1999/8).

²⁶ Lourdes Benería and Amy Lind, "Engender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ncepts, Policy and Action".

²⁷ See Yash Tandon, Globalization and Africa's Options, International South Group Network, Harare, 1999, at p. 11.

²⁸ See, Jackson, op. cit., at note 3, pp. 824-825.

²⁹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 15 April 1994. Reprinted in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 33, at p. 67.

³⁰ The 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15 April 1994, Annex 1C to the Marrakech Agreement. Reprinted in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 33, at p. 81.

³¹ The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P).

³² The 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TRIMS), 15 April 1994 in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reaties Booklet 1, Release 95-1, at 161 (Joseph F. Denin, ed.), 1995.

³³ See Jackson op. cit., at note 3, p. 825.

³⁴ Joseph F. Stiglitz, "Trade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A New Agenda",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1999), at p. 387.

³⁵ See Barry Coates, "Why Free Trade is A Myth", The Independent, London, 10 October 1999.

³⁶ Ahmed Mohiddin, "Partnership: A new buzz-word or realistic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vol. 41, No. 4 (1997) at p. 7.

³⁷ As Robert Howse and Makau Mutua have pointed out, the preamble to the WTO Agreement only refers to the raising of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not explicitly to human rights. See, Robert Howse and Makau Mutua, Trading in Human Rights: The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CHRRD (April 2000), at p. 13.

³⁸ For a good analysis, see Yash Tando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Africa’s Marginaliz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3, No. 1 (1999), at pp. 83-94.

³⁹ Myriam Vander Stichelle, Trade Policy, the WTO and Gender (Information Paper of the Informal Working Group on Gender and Trade, November 1998), esp. pp. 16-20.

⁴⁰ Gerry Helleiner and Ademola Oyejid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Global Negotiation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UNDP, Globalization with a Human Face: Background Papers to th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at p. 112.

⁴¹ Anne-Christine Hubbard and Marie Guirand, The WTO and Human Rights; FIDH Position Paper (November 1999); accessed on 14 May 2000.

⁴² The Organization for African Unity (OAU) issued a statement that mainly condemned the processual aspects of the meeting, using words such as a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African countries: “We a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over the stated intentions to produce a ministerial text at any cost including at the cost of procedures designed to secure participation and consensus”. See, “Africa Rejects WTO Deal” (AFP), reported in the The New Vision, Kampala, 4 December 1999, at p. 31.

⁴³ “WTO Talks End in Failure” (AFP), reported in The New Vision, Kampala, 6 December 1999, at p. 61.

⁴⁴ As Baker Wairama points out, a country like Uganda has only a single trade representative at the WTO headquarters in Geneva compared to an average of seven from each OECD country, supported by a coterie of aides. Baker G. Wairama, “Impact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on Uganda”, paper presented to a Uganda Law Society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Uganda: Closing the Gaps, Kampala, April 2000, at p. 4.

⁴⁵ Havana Declaration of the G-77 South Summit, 14 April 2000 (accessed on 6 May 2000 at: <http://www.g77.org>).

⁴⁶ This was implicit in a veiled attack made by World Bank President James Wolfenson on the conditionality strategies applied by the Fund. See, Stephany Griffith-Jones and José Antonio-Ocampo, The Poorest Countries and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Almquist and Wiksell International, Stockholm, 1999, at p. 56.

⁴⁷ At Seattle, Secretary-General Kofi Annan issued the same message to the trade ministers, stating:

“... globalization must not be used as a scapegoat for domestic policy failures.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must not try to solve its own problems at the expense of the poor. It seldom makes sense to use trade restrictions to tackle problems whose origins lie not in international policy. By aggravating poverty and obstructing development, such restrictions often make the problems they are trying to solve even worse.”

Kofi Annan, “Globalization - No Excuse for Domestic Failures”, The East African, 6-12 December 1999, at p. 12.

⁴⁸ One such area is the issue of labour rights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 (ICFTU) and the American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FL-CIO) are pushing to have included in WTO. However, as Walden Bello has argued, such a strategy is deeply flawed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First, by pursuing this objective through the WTO the IFCTU is conferring legitimacy on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which - at every other turn - squeezes and exploits workers. Second, it disregards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 WTO agreements prohibit or restrict the power of national governments to implement policies which would improv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mass of workers,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who comprise 59 per cent of the workforce in the Third World. Finally, and critically, it completely ignores the decisive role of footloose capital in keeping wages low and pitting worker against worker.”

Nicola Bullard, “It’s time for ‘uncivil’ society to act”, Focus on Trade, No. 47 (March 2000, accessed at: <http://www.focusweb.org>).

⁴⁹ See Krysti Justine Guest, “Exploitation Under Erasur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ngag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delaide Law Review, vol. 19, No. 1 (1997), at p. 81.

⁵⁰ Vandana Shiv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Bioethics”, paper presented at El Tall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General Assembly on “The New Millennium: Globalization and its Challenges”, Tunis, 12-16 November 1998 (on file with author).

⁵¹ There are numerous other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issu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WTO, including the potential impact on agriculture and health services. See the report by Dagi Kimani, “Intellectual Property Bill Faces Opposition”, The East African, 29 May - 4 June 2000, at p. 7.

⁵² Stiglitz, op. cit. at note 34, p. 387.

⁵³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CSTD), “Quad Offers Weak Starting Point for Confidence-building Package”, in Bridges: Between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Year 4, No. 3 (April 2000), at p. 2.

⁵⁴ See, Andrew L. Strauss, "From GATTzilla to the Green Giant: Winning the Environmental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19, No. 3 (1998), p. 729.

⁵⁵ Needless to say, the Bank still has its critics. Writing in The Guardian, George Monbiot states:

"Every one of the bank's policies is beset by contradictions. It claims, for example, to be the champion of free choice, yet its prescriptions are resolutely Maoist. It promulgates precisely the same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everywhere on earth, regardless of circumstance. It rules not by science but by sloga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ill be achieved by mea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privatization',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It keeps pursuing its crazy schemes even in the face of repeated failure ..."

See, George Monbiot, "World Bank Promotes Poverty", The New Vision, 16 April 2000, at p. 6.

⁵⁶ See Cord Jakobeit, "The World Bank and Human Development: Washington's New Strategic Approach",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No. 6 of 1999, at p. 4.

⁵⁷ Se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World Bank,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 The Role of the World Bank (1998).

⁵⁸ See, Shalmali Guttal, "The Many Uses of Poverty", Focus on Trade, No.50 (May 2000). In the case of Uganda - one of the first beneficiaries of the HIPC initiative - it appears that the Bank has now introduced new conditionalities after the Government met all those initially set. The Uganda Debt Network (the local branch of the Jubilee 2000 campaign) referre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conditionalities as a "shifting of the goal posts". Uganda Debt Network, "Open Letter on Debt Relief for Uganda", 19 May 2000.

⁵⁹ "Who will stand up to IMF for reform?" (German Newspaper News Service), The New Vision, 27 September 1999, at p.12.

⁶⁰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ood Governance: The IMF's Role, 2 July 1997 (accessed on 10 March 2000 at: <http://www.imf.htm>).

⁶¹ Ibid., preamble at p. 1.

⁶² Ibid. para. 6.

⁶³ The impasse ended when the United States agreed to support Europe's second candidate, Horst Koehler - the former head of Eastern European Development Bank. Se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ace Appears Over After US Endorsement", Business Recorder, 15 March 2000 (accessed on 27 May 2000 at: <http://www.brecorder.com/story/S00SDC15/SDC15172.htm>).

⁶⁴ See Helleiner and Oyejide, *op.cit.* at note 40, p. 111.

⁶⁵ Greg Mills,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 in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 No. 1 (1998), at p. 83.

⁶⁶ For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ests involved and of the role of the IMF, see Walden Bello, "Speculations, Spins and Sinking Fortunes", Development Dialogue (1998: 1), p. 42.

⁶⁷ See IMF, Annual Report 1997, esp. pp. 59-60.

⁶⁸ Se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ssion on General Oversight and Investigations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105th Congress (1998), at p. 5. See also, David Katona, "Challenging the Global Structure through Self-determination: An African Perspective",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14, No. 6 (1998), at pp. 1458-1462.

⁶⁹ For example, the Fund appointed a team led by John Crow - the former head of the Bank of Canada - to analyse its operations last year. In a report that was issued just before its annual meeting towards the end of 1999, the IMF was accused of "... failing to anticipate crisis sp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setting the wrong priorities in its efforts to tackle economic problems around the world, and failing to reform a bureaucratic culture where employees are often afraid to speak out or strongly express their own view". "IMF Now Under Fire" (German Newspaper Service), The New Vision, 28 September 1999, at p. 10.

⁷⁰ Thus, First Deputy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Fund Stanley Fischer could offer the following counsel to the people of Bulgaria: "... for now the transition process may feel as though it is all effort and no reward. But other countries have been through the same adjustment pains and emerged stronger and better off in the end." See, "The Lessons of Reform - Ten Years On", (accessed on 27 May 2000 at: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peeches/2000/052500.htm>).

⁷¹ See, Joseph Stiglitz, "The Insider: What I Learned at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The New Republic (online), 17 April 2000 (accessed on 2 May 2000 at: <http://www.thenewrepublic.com/041700/stiglitz041700.html>).

⁷² Gordon Smith and Moisés Naím, Altered States: Globalization, Sovereignty and Governance, Ottaw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ouncil, 2000, at p. 17.

⁷³ Louis Uchitelle, "World Bank Economist Felt He Had to Silence Criticism or Quit", New York Times, 2 December 1999 (accessed on 16 April 2000 at: <http://www.globalpolicy.org/socecon/bwi-wto/stiglitz2.htm>).

⁷⁴ Smith and Naím, *op. cit.*, note 712, at p. 43.

⁷⁵ Jan Arte Scholte, "Globalization,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 in Post-Communist Romania", Democratization, vol. 5, No. 4, at pp. 66-67.

⁷⁶ Bridget Anderson, Britain's Secret Slav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light of Overseas Domestic Workers, Anti-Slavery Society, London, 1993.

⁷⁷ Ibid., at p. 71.

⁷⁸ See Terri Judd, "Dead Man Thought Racism was Routine", The Independent, London, 3 November 1999, at p. 4.

⁷⁹ See Guest, *op. cit.*, note 49, at pp. 79-82.

⁸⁰ Stephen Small, "Racism, Black People, and the City in Britain", in Globalization and Survival in the Black Diaspora: The New Urban Challenge, (Charles Green, e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97.

⁸¹ For example, it is only very recently that an individual complaints mechanism for women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CEDAW mechanism.

⁸² United Nations, 1999 World Survey on the Role of Women in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Gender and W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99.IV.8) at p. 9.

⁸³ Ibid., p. 8 note 23.

⁸⁴ One estimate states that of the 27 million people employed in EPZs worldwide, a phenomenal 90 per cent are women. See, John Hilary, Globalization and Employment: New Opportunities, Real Threats (Panos Briefing No. 33, May 1999) at p. 1.

⁸⁵ UNDP, *supra* note 7, at p. 14.

⁸⁶ Riham el-Lakany, WTO Trades off Women's Rights for Bigger Profits, Women'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News & Views), vol. 12, Nos. 2 and 3 (November 1999) at p. 1.

⁸⁷ Ibid., p. 11.

⁸⁸ Ibid., p. 10.

⁸⁹ Ibid., p. 14, and Lin Lean Lim, More and Better Jobs for Women: An Action Guide, ILO, Geneva, 1999, pp. 19-20.

⁹⁰ The role of employment and work in poverty eradication: the empowerment and advancement of women: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18 May 1999) (E/1999/53).

⁹¹ Lim, *op. cit.* at note 89, pp. 19-20.

⁹² Ibid., pp. 30-31.

⁹³ See Deborah Spar and David Yoffi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Prospects for Justice",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ring 1999), vol. 52, No. 2, p. 557.

⁹⁴ United Nations, op. cit., at note 82 at p. 10.

⁹⁵ Lim, op. cit. at note 89 p. 31.

⁹⁶ Ibid., Box 1, p. 11.

⁹⁷ Laurie Nicole Robinson, "The Globalization of Female Child Prostitution: A Call for Reintegration and Recovery Measures Via Article 39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vol. 5, No. 1 (1997), p. 239.

⁹⁸ Ibid. at pp. 31-32.

⁹⁹ United Nations, op. cit., at note 82, pp. 11-12.

¹⁰⁰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Rural Women and Food Security: Current Situation and Perspectives, 1998, pp. 43-44.

¹⁰¹ See supra note 90, paras. 19-21.

¹⁰² United Nations, op. cit. at note 82, pp. 15-16.

¹⁰³ Report of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Beijing, 4-15 September 1995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96.IV.13), chap. I, resolution 1. Strategic Objective A. 1, pp. 40-44.

¹⁰⁴ See supra note 90, paras. 48-49 (emphasis ours).

¹⁰⁵ Ibid. at paras. 58-62.

¹⁰⁶ A/CONF.157/24(Part I), chap. III. para. 5.

¹⁰⁷ Se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45), Preamble, Article 1 and Article 55.

¹⁰⁸ Ibid. Articles 55 and 56 read together.

¹⁰⁹ Ibid. Article 28.

¹¹⁰ Ibid. Article 30.

¹¹¹ Report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Thirty-seventh Session, Supplement No.40, (A/37/40) (1982), annex V.

¹¹² See also Dominic McGoldrick,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It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larendon Press, 1991, pp. 329-330.

¹¹³ General Comment No. 3 (1990),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Report on the Fifth Sessio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Official Records 1991, Supplement No. 3 (E/1991/23-E/C.12/1990/8), annex III.

¹¹⁴ Maastricht Guidelines, clause 6.

¹¹⁵ Ibid. clause 11; Limburg Principles, clauses 70-72.

¹¹⁶ Maastricht Guidelines, clauses 14 and 15.

¹¹⁷ Ibid., clause 9.

¹¹⁸ Ibid.

¹¹⁹ Limburg Principles, clauses 25-28. Maastricht Guidelines, clause 10.

¹²⁰ Maastricht Guidelines, clause 18.

¹²¹ Article 1 in both the ICESCR and the ICCPR.

¹²²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1803 (XVII) of 14 December 1962.

¹²³ See Janelle Diller and David Levy, "Child Labour, Trade and Investment: Toward the Harmo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1, No. 4 (1997), at p. 678.

¹²⁴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41/128 of 4 December 1986, article 1.

¹²⁵ Ibid. article 2.

¹²⁶ Ibid. preamble and article 1.

¹²⁷ Report of the World Summ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Copenhagen, 6-12 March 1995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96.IV.8), chap. I, resolution 1, annex I and II.

¹²⁸ See e.g. the final report prepared by Mr. José Bengoa,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in particular,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E/CN.4/Sub.2/1997/9 and E/CN.4/Sub.2/1998/8).

¹²⁹ See supra note 127, annex I, para. 14, (emphasis ours).

¹³⁰ Reproduced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Reports, vol. 6 No. 4 (1999), p. 1176.

¹³¹ The concern of the Committee about globalization has continued, and recently led to a meeting between the Committee and activist organizations on the subject of globalization during the Committee's May 2000 session. See, The role of 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meeting on 6 May 2000 at Palais Wilson).

¹³²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preamble.

¹³³ Comment on the Seattle meeting by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Also preface by the High Commissioner to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A Progress Report, 1999.

¹³⁴ The issue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 toda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essential ingredients of the processes of globalization - has concerned United Nations agencies for a long time. Se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African Alternative Framework to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 for Socio-economic Recovery and Transformation (AAF-SAP), E/ECA/CM 15/6/Rev.3 (1989).

¹³⁵ See, e.g.,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says fight against poverty emerging as one of greatest challenges of the times, press release, ECOSOC/5877 (28 October 1999);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debates benefits and disadvantages of globalization of world economy, press release, ECOSOC/5704 (2 July 1997).

¹³⁶ By decision 1999/102 of the Sub-Commission.

¹³⁷ Resolution 1999/10 of the Sub-Commission.

¹³⁸ Statement by 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on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May 1998).

¹³⁹ State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to the Third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eattle, 30 November to 3 December 1999) (E/C.12/1999/9) (26 November 1999), para. 6.

¹⁴⁰ Ibid., para. 3.

¹⁴¹ General Comment No. 12 (1999): 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Report on the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 Sess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Official Records 2000, supplement No. 2, annex V.

¹⁴² Ibid., para. 20.

¹⁴³ Ibid., para. 41.

¹⁴⁴ See, e.g.,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CEDAW on periodic reports of Argentina and Italy considered at its seventeenth sessio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sessions)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fifty-second session, supplement No. 38 (A/52/38/Rev.1), paras. 295 and 345 respectively. See also,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Report on the twentieth session (CRC/C/84) (5 March 1999), paras. 211-213, which records a marginal statement made by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IMF at the session acknowledging the link between child rights and a stabl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¹⁴⁵ The same realization is what lies at the core of the Copenhagen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 adopted at the World Summ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 1995, op. cit. at note 127.

¹⁴⁶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ter 4.

¹⁴⁷ Ibid., chapter 5.

¹⁴⁸ See generally, Hugo Stoke, "From Norm to Action: Standard-setting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Child Labour", in Human Rights in Development, 1998 and Michèle Jackson, "A New Convention to Eliminate the Economic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Tribune des droits humains, vol. 6, No. 3 (1999), p. 36.

¹⁴⁹ Michel Hansenne, "Globalization, Liberaliz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Challeng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ublic address by the former Director-General of ILO, accessed on 20 May 2000 at: <http://www.ilo.org>.

¹⁵⁰ UNCTAD has conducted numerous studies - some of them path breaking - that have raised serious questions about the so-called Washington Consensus. The organization is also recognized for having produced the most lucid examination of the Asian crisis and of offering a cogent response to it. See, for example, UNCTAD, Global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on Poverty, (UNCTAD/ECDC/PA/4/Rev.1), 1996.

¹⁵¹ See "UNCTAD X: Pies, preachers and poets", Focus on Trade, No. 46 (February 2000).

¹⁵² See, Walden Bello, "UNCTAD X: An Opportunity Lost?", Focus on Trade, No. 46 (February 2000).

¹⁵³ See further Elena Mancusi-Materi, "Review of Development Approaches of UN Agencies", Development, vol. 42, No. 3 (1999), pp. 97-99.

¹⁵⁴ See "Good Intentions That Paved the Way to Arsenic Hell",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No. 6 of 1999, at p. 29.

¹⁵⁵ Statement by 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e Rights on Globalization, op. cit., at note 130, p. 2.

¹⁵⁶ See Joshua Karliner, "Co-opting the UN", The Ecologist, vol. 29, No. 5 (1999), at p. 318.

¹⁵⁷ Those problems are clear, for example, with the links (variously described as "dialogue" or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MLIs, such as the Bank and the Fund. A review of the last report of the meeting between the Bank and the United Nations demonstrates that human rights issues did not even feature on the agenda. See, "World Bank, United Nations Enhance Partnership", World Bank News Release, 15 March 2000.

¹⁵⁸ Vandana Shiva, op. cit., at note 6.

¹⁵⁹ Obviously, many others share the same view,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former Bank and Fund employees like Joseph Stiglitz and Barber Conable and (since the Seattle and Washington protests) the media. See, the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Advisory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000, and Ron Scherer and Neil Irwin, "Blueprints for Redesigning the World Bank",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7 April 2000 (accessed on 15 May 2000 at: <http://www.globalpolicy.org/soecon/bwi-wto/wbank/reform3.htm>).

¹⁶⁰ David Slater, "The Spacialities of Democratization in Global Times", Development, vol. 41, No. 2 (June 1998), pp. 20-29, esp. p. 27.
